教育口述史视域下傣傣族乡村现代教育发展研究

——以迪庆州德钦县霞若乡各么茸村为例

王丽清¹

(西南林业大学 文法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教育口述史方法对于文献资料较为稀少的民族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教育口述史视域下,通过对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霞若乡各么茸村的傣傣族群众的深入访谈,以此探究傣傣族乡村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教育口述史 傣傣族 各么茸村 现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9.2 **【文献标识码】**A

近些年来,以教育实践主体的口述材料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口述史研究方法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该方法对于文献资料较为稀少的民族教育史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霞若乡各么茸村为例,在教育口述史视域下,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傣傣族乡村现代教育发展历程进行探究,以此促进对傣傣族乡村现代教育发展成果及发展趋向等问题的思考。

1 迪庆州德钦县霞若乡各么茸村简介

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西北部,滇、藏、川三省交界处,境内主要有藏、滇、汉、纳西、白、回、彝、普米、苗九个民族,其中,傣傣族占迪庆州总人口的30.29%。迪庆州的傣傣族属于云南典型的“直过民族”,在20世纪50年代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和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阶级分化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生产力水平低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迪庆州德钦县东南部的霞若傣傣族乡位于国家级白马雪山保护区和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腹地,平均海拔有2362.6m,总人口有8290人,主体民族为傣傣族和藏族,傣傣族人口占53%。霞若乡辖7个村民委员会,180个自然村寨,其中,各么茸村为纯傣傣族村寨。该村属半山区,海拔2600m,年平均气温16℃,总人口1047人。

2 教育口述史视域下迪庆州傣傣族乡村现代教育的发展

通过深度访谈,在各么茸村收集了不同年龄段的受教育者的教育经历口述资料,以此为依据,参照文献资料,对云南迪庆州傣傣族乡村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展开研究。

2.1 解放前迪庆州现代民族教育的萌生

据文献记载,迪庆的现代学校在设立之初,由于人员和物资的匮乏,学科、课程设置不全,虽“名学校,实则义塾、书院

¹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云南‘直过民族’地区现代教育发展的口述史研究”(编号:AE18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丽清(1981-)女,云南大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

而已”。当时，只有极少数上层的汉族、藏族学生能够接受这样的学堂教育。到了民国时期，迪庆境内的现代民族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 1935 年《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实施苗民教育计划》公布后，中甸、维西、德钦等地设立了省立小学，并试图在边地民族子弟中开展义务教育。关于该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文献中记述不多。在各么茸村采访的达支茸姆出生于 1938 年，据其回忆“解放前，村里没有学堂，只听人讲乡镇上有两个先生，但村里没有人去乡镇上读过书，连有钱人的孩子也没读过。”可见，民国政府的“苗民教育计划”虽然促进了迪庆地区现代民族教育的萌生，但并未在当地的少数民族中全面推行，当时，地处山区或半山区的乡村傈僳族群众接受现代教育的几率几乎为零。

2.2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迪庆州傈僳族乡村现代教育的初步发展

解放后，政府在迪庆各地增加校点，小学遍及各区、乡，县城相继开设了初级中学。随着教师需求量的增加，政府还从内地向迪庆大量调进或分配教师，从而大大推进了迪庆州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滞后及傈僳族民众家庭经济的困难，迪庆州乡村学校傈僳族学生的入学率仍较低。据达支茸姆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邻乡新办了一个学堂，由于学校太小，人口又太多，每个大队只有两个入学名额。1952 年，村里协商决定，送 14 岁的我和 13 岁的扎史品初去学校。可我家条件实在太差，没有能力去上学。村里只能送 14 岁的定主扎史代替我去上学。这是村里第一批入学的两个孩子。”这种状况到“大跃进”时期逐步有了改善，达支茸姆说，“1958 年，村里有了第一所小学，有条件的家庭开始送愿意入学的孩子上学校。”现代学校教育开始在迪庆州傈僳族村寨推行开来。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傈僳族学生的入学率虽然逐步提高，但巩固率仍较低。出生于 1965 年的光明说道，“那个时候要自带粮食，我的家庭贫困，只能带一点粗粮，但也不够吃，所以我只好辍学了。”

对于当时学校的办学状况，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龙市是这样介绍的：“村里的小学那时大概有 300 来个学生，老师有 20 来个。教学楼和宿舍楼都是土木结构的小楼房。教语文、数学等 12 门科目，放假时要用麻绳捆好一大堆书和行李回家。”从这些口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迪庆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较为艰苦，但课程设置较为完善，师资较为充足，学校教育在有序发展。

“文革”时期，迪庆州的教育事业遭受重创。各么茸村村的余泽民还留有“文革”时期学校学习的记忆，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民办教师都撤走了。当时只有乡里的完小才留有一名教师，但离村子太远，我只好辍学。”

2.3 改革开放以来迪庆州傈僳族乡村现代教育的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迪庆州的教育事业逐步走向正轨。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民族教育资金投入，各级各类学校设置逐步完善，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双语教育逐步实施，民族教育水平也不断提升。

这一时期，迪庆州傈僳族乡村现代教育的发展可以从受教育者日渐丰富的教育经历中得以体现。各么茸村的大学生余春莲对其受教育经历叙述如下：

“我 7 岁上小学，要到离家五六公里山路的村小读书，学校有 4 个老师。由于我们听不懂普通话，老师就用傈僳语教。小学阶段，我特别喜欢上语文课。五、六年级学校开设了藏文课，但是没有傈僳文课。村小没有食堂，学生要自己背粮食去学校，自己烧火做饭。三年级时，学校办了一个食堂，国家也开始发各种补贴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每个月每个孩子有 50 元左右。

初中我考入了县城的德钦一中，英语课程的加入，让外语基础为零的我感到很吃力。国家给我们发每个月 260 元的农牧民补贴，每天早上还有营养早餐。高中阶段分文理科，因为数理化没学好，我选了文科。我的英语成绩有了进步。高考时，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可以加 20 分。老师通知我可以去报迪庆专项，可当时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报了一个专科学校。在专科学校读

书时，我参加了各种社团，还加入了民族协会，开始明白了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民族的文化。我也越来越感受到读书和学历的重要性，所以选择了专升本，考入了西南林业大学读本科。”

在余春莲成长的时代，国家不断加大对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直过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迪庆州傈僳族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很大地改善，这为乡村傈僳族学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奠定了基础。而民族加分政策、民族专项招考政策等民族教育政策的实施，也为傈僳族学生创造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在学历提升的同时，多元文化环境的熏染还促进了傈僳族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的自觉。

3 关于迪庆州傈僳族乡村现代教育发展的思考

纵观上述各么茸村受访者的口述材料，由于受教育者所处年代的不同，经历也各不相同，从中对迪庆州傈僳族乡村现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

迪庆州傈僳族乡村现代教育从萌生、发展到兴盛，有多重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由于统治者对边疆民族实行的是阶级教育政策，脱离民族地区的社会实际，很难让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傈僳族群众接受学校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需求，分门别类地制定了各种教育政策和措施，使乡村傈僳族儿童的入学、升学有了充分的保障；其次，是经济环境的影响——解放前，迪庆州各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战争的影响，教育资金和教育资源极为短缺，这从根本上阻碍了当地教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迪庆州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迪庆州各民族在传统的农牧业生产之外，还大力发展商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傈僳族乡村民众的收入不断提高，其教育需求也不断增长。而随着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的实施，教育扶贫的战略地位也不断提升，当地民族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

作横向比较，迪庆州与内地乃至云南很多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既有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处于多元文化交汇中的傈僳族现代教育，需在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国主流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因而，在学校教育中有计划、有效地开展双语教育及其他传承傈僳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活动，也是当前傈僳族现代教育应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迪庆藏族自治州教育委员会. 迪庆藏族自治州教育志[M].云南迪庆:迪庆藏族自治州教育委员会出版, 1988.

[2]迪庆藏族自治州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迪庆藏族自治州志[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